

挥之不去的“中国情结”

[法]雷米 (Pierre-Jean Remy) / 钱林森



法兰西院士、法国当代著名作家皮埃尔-让·雷米 (Pierre-Jean Remy, 1937—) 这个名字, 对从事中法文学、文化关系研究的学者和读者来说, 决不是陌生的名字, 特别是他自去年出任“2003—2005法中文化年”法方主席以来, 频繁来往于巴黎—北京, 其声名和影响, 更为中法文化界、读书界所知晓。作家皮埃尔-让·雷米, 本名让-皮埃尔·安格雷米 (Jean-Pierre Angremy), 1937年生于法国安固勒姆 (Angoulême), 自幼酷爱文学。1963年他从法国国立行政学院 (ENA) 毕业后, 便开始了他的

的中国之旅, 沿着前辈克洛岱尔的足迹, 步入外交官兼作家的职业生涯。他先于1963年作为副档案管理领事入驻香港, 1964—1966年又作为法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入驻北京。他是一位多产作家, 迄今为止已出版50余部作品。他的创作特别引起我们关注的, 是“中国系列”及其对中国文化所怀抱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1971年, 他发表首部“中国小说”《火烧圆明园》(Le Sac du Palais d'été), 荣膺该年度雷诺多 (le prix Renaudot) 文学大奖, 便之一举成名。随后, 他又先后发表《卑鄙的死亡》(Une mort sale)、《中国, 一路旅程》(Chine, un itinéraire, 1977)、《中国》(Chine, 1990) 和新近出版的《北京灰色的房间》(Chambre noire à Pékin, 2004) 等中国系列小说, 成为法国当代文坛描写现代中国题材的著名作家。

我之结识皮埃尔-让·雷米先生, 并滋生拜见他的念头, 始于四年前阅读他的成名作《火烧圆明园》。2004年5、6月我在巴黎访学期间, 经女作家山飒引见, 应邀于6月3日赴雷米先生寓所与之晤谈, 在座的还有张弛博士。雷米先生刚从中国福建访问归来, 我们的交谈便由他的中国因缘、中国小说、中国情结及相关的中法文化关系话题展开。此后我据此拟定了若干问题寄请他回答, 他在繁忙的创作和公务活动中, 抽出时间迅速地逐一作了回答, 以下的对话便是由我的提问和皮埃尔-让·雷米先生的回答而组成的, 雷米先生的笔答由王恬女士协助译出, 顺致谢忱。

钱: 继18世纪启蒙运动作家“塑造中国神话”之后, 20世纪下半叶在法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又曾掀起了一个“重塑中国神话”的造神运动。集结在《原样》(Tel Quel) 杂志社的一些法国当代思想精英和文化精英是“重塑中国神话”的始作俑者, 他们中的领军人物是索莱尔斯 (Philippe Sollers)、克里斯特娃 (Julia Kristeva) 等, 在中法文化关系史上, 《原样》派作家是第一批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直接对话的作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您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

首次来到中国, 开始了您外交官兼作家的生涯。请问: 是什么动因驱使您作这样的选择, 踏上您的东方之旅? 我是问, 您是自觉地步前辈克洛岱尔的后尘呢? 还是如《原样》先锋作家那样对当代中国感兴趣? 你当时对中国的感受是怎样的?

雷米: 我于1963年来到香港, 接着于1964年来到北京, 在那里一直呆到1966年。所以, 远比集结在《原样》杂志社周围的那些作家索莱尔斯或克里斯特娃等人更早地对中国真正感兴趣。对我而言, 这也可说是一种个人的奇遇。我当时是外交官, 我想写作, 先有人向我提议到香港任职, 是坐船去的。于是, 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我不会讲中文, 当时我所了解的中国, 是谢阁兰 (Segalen) 和克洛岱尔 (Craudel) 笔下的中国。在我心里, 装着的纯系文学化的中国神话, 而这一神话正是我当时想急切地去发掘的。在船上度过四个星期的日日夜夜, 可以说是一种转承上下的过渡之旅——一点点地离开欧洲、中东、印度、科伦坡、印度支那 (当时那里的西贡市还是一个完全法国化的城市)——让我慢慢地沉浸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面。我不能说那个时候, 我就对现代的中国感兴趣。我只是对中国感兴趣, 很简单。可能更是对法国作家所描述的那种中国感兴趣。我已发表了两部小说, 其背景是, 一部在美国, 另一部在阿尔及利亚, 我有着一发现其他地方的渴望。我在香港呆了一年, 接着, 就跨越了罗湖桥——与我的朋友一起, 他是历史学家, 今天的法兰西院士。¹我非常欣赏那个年代在中国看到的一切。当然, 在日常生活上, (那个年代) 不能自由地与中国知识分子交往, 甚至自由地交谈都不行, 这是很令人沮丧的事。而且, 要屈从于一系列的禁令也是让人十分懊恼。但那实在是一个极好的差事——作为派驻北京的外交官, 我们可以同时深入到那个年代的我们愿意去欣然了解的“今天的中国”和不经意间在胡同中、在北京周围少数几个对外国人开放的旧地里发现的“昨天的中国”。

钱: 您的中国之旅为您的文学创作获得了最初的成功: 近600来页的煌煌巨作《火烧圆明园》(1971) 一问世便声名鹊起, 得到了巴黎文坛的认可。批评界认为, 您的大作是法国上世纪下半叶“带自传性质的‘中国’小说中的杰作之一”, 对此您有何看法? 有些学者甚至把您这部小说和马尔罗的《反回忆录》和雷里斯 (Michel Leiris) 的《中国手记》(Journal de Chine) 等“中国见证”的自传作品放在一起加以研究, 您认为您的这部小说到底是什么性质性质的作品? 也是一部当代中国的“证词”?

雷米: 您对《火烧圆明园》实在是过奖了。不过在那个年代, 这

[202/203]

1. 即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 (Pierre Nora)。